党风党纪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特点

□ 王　超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有必要结合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和实践来把握其核心特点，深化理解和认识，进一步提高管党治党的科学化水平。

党的意识特别强烈

强化党的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最核心特点。无论是“七一”讲话还是十八大以来的系列重要讲话，都贯穿着强化党的意识这一重要思想脉络。党的意识是政党的灵魂，是执政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是共产党员政治觉悟和党性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强化党的意识”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最能彰显其核心思想的观点包括四个新论断：

一是“第一身份”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体党员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

二是“第一职责”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体党员要牢记自己的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

三是“最高位置”的论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四是“最大政绩”的论断。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

治党理念特别清晰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中最引人关注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党理念贯穿了“从严”的鲜明主线，正如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管党治党，必须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彻全过程，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立规严谨，治党理念与法治精神相契合。突出党章作为“党的总章程”“根本行为规范”的重要地位，要求全体党员必须认真学习、严格遵守，其实质是运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思维，依据党章、党规党纪规范党组织和党员的行为，为依法治国提供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

二是问责严肃，治标和治本统筹兼顾。强调“管党治党要靠纪律和规矩”，要求“把纪律挺在前面”，“不断完善党内纪律的制度化建设，不断加强监督执纪的力度和水平，使纪律成为真正带电的高压线”。这就要求党的建设要着力构建科学规范、系统完备、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权力关进党规党纪的笼子。

三是管控严格，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要求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群众观点特别鲜明

群众观点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最显著特征。无论在地方还是到中央，他都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研究和梳理习近平总书记不同时期的群众观点，可以把其所蕴含的思想概括为“人民主体论”和“人民中心论”。

关于“人民主体论”。习近平强调，围绕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

关于“人民中心论”。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又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始终不脱离、不动摇这个立场，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努力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

问题导向特别突出

突出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蕴含的重要方法论。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体现了共产党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习近平总书记善抓矛盾的治党方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聚焦“进京赶考”的大问题，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全新局面，使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纪大党展现出新的蓬勃生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的高度清醒和自觉。在“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重申了“赶考”问题，明确提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八个方面的工作要求，更针对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成为我们党向着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政治宣言书和集结号，形成了强烈的社会引导。

队伍建设特别强调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队伍力量。因为，我们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挑战没有减弱，还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赶上新一轮科技革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解决社会矛盾防止出现‘颜色革命’”等众多更加艰巨的任务。队伍力量的强大不仅在于人数的众多，而且在于思想的统一和步调的一致。

关于加强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的是党员的高素质培养，提出“打铁还需自身赢”的新论断，要求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提出“补钙”论，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党员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道德情操”，要求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及关头豁得出来，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

通过梳理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党建思想的核心特点，不难发现其思想的全面性、科学性、系统性、协同性，突出了党的建设与党和人民事业的辩证关系，融汇了历史与现实，贯通了理论与实践，联结了治党与治国，体现了继承与创新，是面向世纪政党和长期执政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纲领，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指导党的建设新的实践。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体系怎么构建

□ 张宝娟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是管党治党重要抓手。我们通过深入调研，问卷调查1313人，面向671名党组织书记、418名党组织领导班子其他成员、102名普通党员群众征求意见，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体系”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找准科学定位，并提出构建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体系的对策。

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内容不够全面科学。目前的责任制体系中，责任是核心内容，但对责任主体明确、责任划分、责任履行等内容涉及较少。调查对象中30%认为责任主体不清晰，47.5%认为责任清单不明确。即使明确党建工作责任又相对宏观，大都没有具体责任清单，不便于执行和考量。

权责不够对等均衡。各地普遍强调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但在实际中存在着不平衡问题。一方面，存在责任不均衡问题。对各级党组织责任强调比较多，对党委职能部门责任强调得少；对“一把手”责任强调得多，甚至将党组织集体责任都归为“一把手”个人责任，但对班子其他成员责任强调比较少。另一方面，存在权力和责任不对等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和“一把手”履行责任，但对权力则未予明确，缺乏必要的决策权和话语权。另外，实行垂直管理单位，管理权和用人权往往在上级部门，而党建责任则在地方，权责不对等容易造成党建盲区。

环节不够衔接配套。目前的责任制体系中，大多聚焦单个环节，比较重视责任分解和考核，但对责任履行、督查、评价、追究等环节比较笼统和模糊，有的环节甚至缺失。57.6%调查对象认为责任评价不全面，40.6%认为责任考核不区分，39.1%认为责任追究不严格。各环节相对独立，缺乏整体性；环节衔接不到位，缺乏配套性。

运行不够顺畅有序。大部分地方和单位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和机制保障，导致责任制落实不到位。一般是年初布置、年底考核，年中督查较少；有的地方对责任制考核不够重视，存在着流于形式和过于简单现象，不开展专项考核而是纳入综合考评；不少地方虽建立专项述职制度，但对问题整改缺乏跟踪；有的地方对考核结果运用不够，对履职不到位问责不力。由于制度缺失，导致责任制体系运行不够顺畅有序。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体系的对策

建立责任划分机制，解决“责任架构不清”问题。坚持科学统筹、合理划分，形成自上而下、分级负责的金字塔式责任架构形态。

建立责任界定机制，解决“责任主体不明”问题。科学界定不同责任主体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重点明确几项责任：统揽责任，主体责任，第一责任，分管责任和执行责任。

建立责任细化机制，解决“责任清单模糊”问题。制定责任清单既要体现全面性，又要体现差异性，从根本上解决责任模糊问题。差别化制定全面从责严治党责任清单，细化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机构责任清单。

建立责任督查机制，解决“责任履行不力”问题。要建立全面从严治党常态检查指导制度，主要包括5项具体制度：专项督查制度，重点项目巡查制度，专门约谈制度，定期报告制度和专项述职制度。

建立责任考核机制，解决“责任评判不准”问题。完善科学有效的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制考核办法，重点在提高考核科学度和有效度上下功夫。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解决“责任查处不严”问题。明确失责情形，规范责任认定，从严追究责任。

参考与建议

西北地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 孙景宏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由三原县党组织和渭北党组织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它位于陕西关中地区渭河以北，以三原县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区域，包括三原、富平、耀县、泾阳和淳化五县交界处和高陵县、蒲城县、白水县的部分地区，总面积约750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发展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不仅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

三原县是大革命时期陕西农民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早在1925年，三原县在陕西咸阳地区就率先建立了中共党、团组织。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为了声援国民政府的北伐，配合国民联军解围西安，三原党、团组织即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共产党人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史可轩等相继来到三原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农运干部，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府，在渭北地区率先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农民运动在逆境中持续开展。1928年2月，共产党员黄子文、唐玉怀等在三原县武字区成立了农民游击队，组织发动农民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开展“三分五抗”。1928年3月至1931年4月，三原武字区相继建立了革命武装和党的组织，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游击战争、武装暴动此起彼伏，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浪潮不断掀起。1931年5月至1932年10月，渭北革命根据地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在三原、富平、耀县等地区形成了割据局面，根据地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革命武装建设和土地革命等全面发展。渭北革命根据地从1931年5月创建到1933年8月遭敌残酷围剿失守，坚持红色割据两年多，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动统治，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首次尝试和实践，是西北地区创建时间最早、斗争历史较长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是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从1928年开始，习仲勋从三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征程，投身了革命运动，并参与和见证了渭北革命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多年之后，他对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及其历史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7月，习仲勋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渭北三原武字区，除大革命时期乔国桢同志在那里开辟了群众基础以外，到红二十六军还未到达该地以前，这里就是‘半红半白’的环境，1928年，为了支援渭华暴动，曾发动过三万人的围城斗争。1930年成立了灾民自救军，以后的游击运动从未停止过活动，并领导农民进行了分地、分粮、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杀土豪、反劣绅。另一方面也遭到国民党的捕杀镇压。这也可以看出革命的进程，不能以和平推进，而是在斗争中推进”。在《回忆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一文中，习仲勋写道：“渭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渭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84年7月14日，习仲勋接见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在谈到陕甘边历史问题时指出，“要写陕甘边，一定要先写心字区、武字区、渭北根据地和照金根据地，南梁根据地是继照金根据地之后发展起来的”。1986年4月7日，习仲勋与陕西党史委的习仲凯、白玉洁谈到渭北、陕甘边、陕甘宁根据地史时又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尝试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党组织领导开展群众运动，再从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创建革命武装，通过群众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这种“先依靠群众运动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形式，是渭北和三原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对革命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创建丰富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实践。大革命失败后，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渭北人民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奋起反抗，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共渭北特委、三原县委和武字区党团组织在以武字区为中心的渭北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开展革命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开创了渭北革命根据地，它丰富了全国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实践，推动了区域革命运动的发展，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它是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托

渭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部区域与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相连，照金苏区与渭北革命根据地息息相关。渭北革命根据地既为照金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前哨阵地，也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托。

渭北游击队是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2月，陕甘游击队成立时，三原武字区共产党员黄子祥受党组织委派，带领武字区几十名青年农民参加了陕甘游击队，这些革命青年成为这支西北地区第一个工农红军革命武装的重要源头骨干力量。在陕甘游击队兵员不足、战斗力消弱的危难时期，三原武字区和渭北游击队多次为陕甘游击队补充兵员。6月13日，陕甘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带领陕甘游击队一个班返回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中共武字区委在三天之内组织动员了近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加入了陕甘游击队，有力地支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照金苏区建立后，习仲勋、金理科、黄子文、周冬至、金天华、黄子祥、杨森、黄罗斌等主要干部先后从渭北根据地进入照金苏区，推动了照金苏区的创建和发展。

渭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游击队活动的主要区域和回旋空间。1932年4月中旬，陕甘游击队第三、第五支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多路追剿堵截。4月21日，阎红彦、杨重远率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配合武字区游击队攻击了马额镇王茂臣民团。4月23日清晨，为避敌重兵袭击，黄子文带领五支队转移到照金与旬邑交界地带开展游击战。1932年8月，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追剿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历遭险阻，接连受挫，伤亡严重，王明“左倾”路线的追随者也对陕甘革命和陕甘游击队带来了严重干扰。在“内忧外患”的不利形势下，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习仲勋等将刘志丹特意留在照金的特务队转移到了正处于革命鼎盛时期的三原武字区。三原武字区为保存和发展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特务队提供了回旋空间和重要依托。

渭北根据地为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渭北根据地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和陕甘红军各类急需物资的支援供应基地之一。1932年—1933年，武字区军民在连续五年大旱灾荒之时的异常困难时期，克服各种困难，为陕甘游击队多次提供了紧缺物资，同时也为陕西省委在几度困难时期提供了不少经费。1933年—1935年间，习仲勋、周冬至等多次冒着风险回到三原武字区，利用武字区这条连接渭北根据地与照金苏区的秘密通道，与武字区军民一起将布匹、药品、粮食、枪支弹药等急需物资秘密送往陕甘边区，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钱粮武器支持。

渭北游击队随红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1932年12月下旬红二十六军成立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红二十六军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12月底，渭北游击队编为两个中队前往照金，配合红二十六军开辟照金新苏区。1933年11月8日，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组建的红四团改编为四十二师骑兵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改编后，黄子祥、杨森率骑兵团向西北方向进发，帮助二、三路游击队恢复和发展照金苏区，扩大游击区。以三原武字区、心字区人民为中坚骨干的渭北游击队——红四团——红二十六军42师骑兵团积极配合西北红军开展的英勇斗争，既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苏区和南梁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前进基地。

渭北苏区是红军改编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基地。红军改编时大部分驻扎在渭北苏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致电请求，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于1936年底到1937年8月陆续进驻渭北地区。1936年12月下旬至1937年1月上旬，红军主力由陕甘边相继到达渭北地区的泾阳、三原、富平、高陵等地集结，形成了内线策应友军、外线迎击国民党中央军的军事态势。在国难当头之际，以泾阳、三原、富平、高陵为中心的渭北苏区成为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进行改编、请缨杀敌和抗日救亡的战略后方。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在渭北苏区的泾阳、三原、富平、高陵一带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改编誓师之后，八路军三个师大部分从渭北苏区的泾阳、三原、富平开赴抗日前线。中国工农红军在泾阳、三原、富平等县的顺利改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转变。

党史记忆